

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暨全国 第五届清史学术讨论会述要

金铭

1989年11月7日至11日,在南京举行了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辽宁省社会科学院、辽宁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安徽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11个单位联合发起的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暨全国第五届清史学术讨论会。赴会的有中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等国家的98名清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与会学者提交论文69篇,以康乾盛世与康乾南巡为主题,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康乾文治武功。会上,有关政治、军事、外交、司法、少数民族、人物评价、地方政区和学术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讨论,涉及面广,内容宏富。关于康乾政治。这是讨论得较为深入的课题,而尤其集中在政治对盛世的影响问题上。卢明辉论盛世文化交流,认为经过康雍乾三代的经营,形成了南北文化纵向交流、共同发展的大交融契机。王松龄论廉政与盛世的关系,认为康雍乾三朝前后相继推行廉政,促进了政治上的治世、经济军事上的强世,从而产生了盛世。韦庆远着眼于雍乾政局与治道同异,认为乾隆在许多重大政策上继承了雍正的决定,在若干重要方面又作了较大的更张、纠正和充实,由此清朝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南书房向来被人视为康熙的秘书班子,朱金甫不以为然,认为南书房即或负有一些特殊任务,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它曾起过中枢机构的作用,因而对其政治作用及其历史地位不能估计过高。白新良和赵秉忠探讨经筵日讲与康熙政治的关系,认为康熙积极投身经筵日讲,使其颇为全面地掌握了传统的治国理论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对康熙时期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促成了康乾盛世的到来。孟昭信论罢黜明珠与争取江南士大夫的目的和作用,认为它是康熙全面推行江南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有利于稳定江南及全国的政治形势,进一步缓和满汉民族矛盾,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赵秉忠、白新良论乾隆惩贪,认为乾隆严惩贪官,对整饬吏治,纯洁官僚队伍,克服腐败,保证财政收入,促进社会安定,维持康乾盛世的局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阎光亮分析了乾隆初年的宽严相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的实施并不断趋于完善,对发展社会经济、推动清朝进入盛世起了积极作用。朱诚如论述了乾隆训政与和珅擅权的关系,指出乾隆在执政的中后期对和珅已是倚如股肱,训政后更加信赖和珅,和珅成了乾隆训政的实际执行者。关于康乾军事。王思治评述了康熙对乌兰布通之战的总结和多伦会盟的历史作用,认为多伦会盟既为彻底击败噶尔丹作了准备,又推行了清政府的各项制度,从而使清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与统治制度化,向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迈进了一步。李鸿彬系统论述了乾隆时抗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起因、经过和社会影响,认为清军驱逐了廓尔喀侵略军,收复了被占领的土地,不仅对西藏社会安定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对清廓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定宜庄探讨了乾隆朝驻防汉军出旗问题,认为清廷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解决日益严重的八旗兵丁生计贫困问题,是为了保证并扩大满州正身旗人的食饷份额。徐明德评价了台湾籍水师名将王得禄的功过。关于康乾外交。有台湾学者利用新发现的满文中俄尼布楚条约文本,与清代官方史书的有关记载详细对照比勘,指出了后者的不少不足之处,认为只有联系中俄两国在1689年前后整个历史、民族和当时的真实环境

等因素,才能更客观地评价中俄尼布楚条约。苏联学者那塔里亚则探讨了康熙时期中国对俄外交意图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朱亚非以乾隆时的征缅战争为例,分析了清朝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关于学术思想文化,王廷元分析了王夫之的理欲观,他不同意王夫之是反禁欲主义思想家的提法,而认为王夫之所提倡的人欲是在封建道德观念支配下,维护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章学诚的史德论,备受人们称许,乔治忠却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章氏基本上接受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很自觉地将理学的观点发挥于史学理论,他的史德就是运用理学观点分析文史问题。要求史家尽天理、养心性,评述史事勿违纲常伦理,特别是不可谤主诽君,这种史德完全是理学的道德规范在史学上的移植。一些学者如伍贻业、宫慧如、赵德贵、傅贵九和何兆龙等还考察了17世纪中国的伊斯兰教思潮、康熙的教育思想、《四库全书》著录《八旗通志》的讹误、盛世修志与文字狱的关系和六经皆史等问题。此外,在其它课题的讨论中,季士家考述江南分省时间,关嘉录论上三旗包衣佐领,何龄修分析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张捷夫考察容美土司案等,或思路开阔,或选题独特,发微探幽,皆有新意。

二, 康乾社会。社会史是近年来人们较为关注和较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这次讨论会上,不少人兴致勃勃地探讨清代社会问题,而且视野开阔,新见迭出。清代贱民问题,一直少人问津。经君健将清代贱民作为一个等级来探讨,认为贱民分四个等第,各个等第的法律和社会地位各有差异,贱民既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也有压迫者和剥削者。雍乾之际的士风,迥异清初,郭成康认为当时的士大夫已经丧失了关怀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优良传统,而沦为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皇帝的附庸。满人丧葬习俗,前后变化较大,岑大利逐一加以考述。爆发于康熙末年的台湾朱一贵起义,对其原因一向诸说不一,会上张莉依据满汉文档案,认为朱一贵起义是一场典型的反勒索、反压迫的农民反抗斗争,而不是由天地会人员领导的反清复明运动。地方吏治,攸关民生,柏桦通过康雍乾时期60余县2450余名知县出身的统计,发现各种出身的知县由于名份等级的不同,在施政时受到不同制约,乃至直接影响当时的吏治。宗法家族问题,也是会上不少学者关注的课题。常建华分析了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认为其政策是以抑制为主,也有一定的支持和打击,其治理宗族惩治械斗健讼的实践却未能根本解决问题。江太新探讨了土地买卖中的宗法关系,对土地买卖要受到宗法关系严重影响或有些地区主要是在宗族内部进行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清代前期宗法关系对土地买卖的束缚作用在逐渐削弱,土地买卖趋向自由化。日本学者井上彻则以珠江三角洲为对象,探究了宗族的形成和构造,提出宗族组织包含着多样的机能,而主要是以继续官僚的家系为目的的新说。吴建雍探讨了清前期北京城区的社会结构,认为它分为内城八旗和外城汉官、民、商两个部分,但这两个部分又是紧密相联、互相依靠、不可分割的。张玉兴考察了清前期关内的辽东人和东北地区的流人作出的贡献,发现清初率兵打天下的将领、遍布各地之督抚、有出色业绩和成就之政治家与文化人,多是辽东人,而清代流人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保卫边疆斗争作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学者李中清依据八旗户口册,分析了沈阳地区一百年间家庭结构与人口行为的关系,认为75%的人是生活在由两对或两对以上夫妇住在一起的复合型家庭里,而大多数人又是住在非直系亲属组成的复合型家庭里。不同的家庭结构,结婚率和生育率也就不同,而死亡率与它们的关系则差不多成反比。

三, 盛世经济发展。会上交流的论文,涉及本专题的最多,并且尤其集中在农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上。关于农业经济,以往论者多侧重于商业性农业的考察,这次会上大家采

用多方位、多层次方法,对清代农业的诸多方面作了探讨。闵宗殿从农业政策角度,阐述了清政府奖励垦荒,开发边疆,发展多熟种植,引进高产品种,开展综合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等措施。游修龄从农学角度加以探讨,认为其成就是农书大量增加,精耕细作和复种套种更加充实丰富,农学理论较前代有所发展,存在问题为农业赖以发展的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同期欧洲相比差距甚大。郭文韬从耕作技术角度论述,认为康乾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同当时南方的耕作改制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陈家其从气象角度,考察了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郑云飞从农业技术角度,分析了湖丝成因,认为杭嘉湖地区的蚕丝之所以品质优良,除了气候条件外,与桑树栽培技术、桑叶叶质和养蚕技术等都有关系。陈学文和朱自振、叶依能等则从商业性农业的角度,分别探讨了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和宜兴、长兴两县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前者认为,传统的单一稻作自然经济向着以蚕桑为主体综合性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杭嘉湖整个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学者王国斌则从宏观上把握农业经济与清代国家的关系,认为清代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商品化生产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却无法克服农业经济粮食供应不稳定的基本问题,因而国家积极加入专业化和商业性的经济扩张过程,在边区鼓励增长,又支持长途贸易将全国整合一体。关于商业经济,商人及其经营方式是会上讨论的热点。唐力行考察了徽州木商由地方小市场发展至区域性市场以及国内大市场的经营过程、经营方式及其长途贩运对社会经济所发生的影响。张正明考察了清代山西商人的发展特点及其历史条件和利润去向。罗仑利用新发现的《生意世事初阶》一书,探讨了江南坐商的经营内幕,认为当时的江南坐商已普遍遵循和恪守待客的经商原则,已牢固树立了顾客至上的经营方针。阮明道则考察了官商的经营特点及其危害,认为其特点是利用政治权力或在政治权力庇护下从事一系列违禁活动;其危害是对政权腐蚀,对民间商业摧残,对广大民众掠夺。鲁子健论述了清前期的藏汉边茶贸易,认为这种贸易推动了土司土官内附,增强了藏区各族人民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加强了民族联系,促进了藏汉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许植、经君健则通过对鸦片战争前清代税则、税率及当地税额增减状况的分析,强调清代商税额是逐步增长的,其增长主要是流通量扩大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加重剥削的结果。除了农业和商业外,俞玉储、徐建青考察了赋税蠲免,刘德仁、陈然和蒋兆成考察了盐业,董郁奎探讨了水运与市镇的关系,萧国亮分析了小农家族经济,使本专题的讨论气氛更为热烈。

四、康乾南巡。有关康乾南巡,历来褒贬不一。这次讨论会上,大致形成大相径庭的两种看法。孙文良认为,南巡是康乾盛世的开始,标志着清朝由武力征服向文教政治转变,南巡主要是治河,治河也是治国,南巡促进了康乾盛世的形成。彭云鹤所持观点与此相近。持相反看法的朱金甫、李林则认为,皇帝的巡幸是百姓的灾难,南巡与东巡一样,都是劳民伤财之事,有渲染太平盛世的味道,南巡就是为了游山玩水,不必回避。此外,张芳、徐凯、张华和吴建华等强调,以往对南巡褒康熙而贬乾隆的评价是客观的,乾隆南巡治河、筑海塘均为有益之举,是促成乾隆盛世的重要因素,康乾南巡的评价应该平衡,不能抬康熙而抑乾隆。夏维中、范金民等也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康乾南巡的看法。

综述这次讨论会,与会学者或交流了新的材料,或运用了新的方法,或开拓了新的领域,或提出了新的见解,收获良多。清史学界与农史学界全面交流研究成果,多所启迪,互有裨益。海峡两岸学者欢聚一堂,首次共同研讨清史问题,使两岸清史学术交流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特别令人振奋。与会学者的年龄趋向年轻化,展示出清史研究新人辈出、大有希望的广阔前景。总之,新人、新方法、新角度、新观点,形成本次讨论会的一大特色。